

南诏·大理史论文集

张 旭 主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寿孙

封面设计:夏沅生

南诏·大理国史论文集

张旭 主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39号)

云南电力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字数:29万

1993年6月第一版 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

书号: $\frac{ISBN7-5367-0772-0}{K \cdot 191}$ 定价:9.80元

目 录

前言	(1)
试论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	杨永新 赵寅松 (6)
南诏王室的族别初探、再探	李一夫 (22)
南诏王室的族别再探	李一夫 (32)
南诏和白族的几个问题	王元甫 (38)
南诏、大厘城河蛮大姓世系考	
——大理喜洲白族十大姓研究	张锡禄 (66)
南诏西洱河蛮大姓及其子孙	张旭 (110)
白族先民东洱河蛮大姓及其子孙	苏松林 (133)
大理北汤天白族大姓董氏族谱研究	董国胜 (150)
大理国段思平世系出自武威郡质疑	杨延福 (161)
南诏、大理国史的新开拓	白鸟芳郎 (169)
张旭著《大理白族史探索》评介	石钟健 (172)
白族起源试探	施珍华 (178)
云南祥云县检村石椁墓	李朝真 (184)
洱海区域的古代文明	陈亮 (192)
大理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	杨德文 (206)
大理古代若干科技成就讨论	李万昌 李晓岑 (215)
洱海地区汉晋时期文物补史	杨延福 (231)
南诏有字瓦的调查和看法	田怀清 (237)
大理古代绘画和雕塑概述	杨晓东 (274)
剑川石钟山第七号石窟王者像新释	田怀清 (312)
南诏“沙賧贾客”的衣胞之地	
——大理喜洲释名	张旭 (319)
弥渡几座古城遗址考	张昭 (324)
南诏龙尾城考释	吴棠 (331)
洱海考	施立卓 (337)
论白族古老盛典“火把节”	张锡禄 张了 (342)

前 言

自唐玄宗开元 26 年（公元 738 年），蒙舍诏主皮罗阁在唐王朝的支持帮助下，进入河賧，兼并了太和、羊苴咩、大厘三座河蛮城邑，被封为云南王起，到 1254 年忽必烈率领蒙古大军灭了大理国时止，共计 515 年。这期间蒙氏为 164 年，郑、赵、杨三家为 35 年，段氏为 316 年。如果再把细奴罗自立为王，历其子罗盛及孙盛罗皮三代共 89 年加上，则为 253 年；而段氏也把被削去了帝号降为大理总管，但仍保留着一部分权力的 128 年加上，则为 444 年。蒙、段两家合计为 697 年，与唐、宋、元三个王朝相始终。这就是说，蒙、段两家前后相沿约七个世纪的时间，是大理地区的主体。对我国西南边疆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开发有过卓越贡献。

在这里应该说，蒙氏是创业者。他用了两个半世纪的时间，唯自己利益之所在，先是依靠唐王朝制止了吐蕃对西洱河地区指染，继又转过来与吐蕃联合，打得 20 万唐军在西洱河全军覆没。从此以后，整 500 年唐军及其他外军，再没有进入过西洱河地区的了。但过了不久，他又反转过来与唐军联合，大败吐蕃军于神川，吐蕃王室从此一蹶不振，终至灭亡。于是他就更肆无忌惮的四出西川，三下交趾，一进黔中，扰乱得唐王朝顾此失彼，陷入混乱。传说他还派兵救援缅甸，击退狮子国兵。他就这样在中南半岛上建立起北至大渡河、西南到大金沙江，东到交趾的幅员广阔的军事大国。但他自己也因长期穷兵黩武，搞得人穷财尽，民不聊生，最后也就与唐王朝相继覆亡。赵匡胤建立了宋王朝，他接受了唐代的教训，划大渡河为界，不准南人过河。而大理国段氏也同样在得国之后，重在守成，不派兵外出，与宋王朝和好相处了 300 年，

最后才同时被蒙古军灭亡。

这里再须要特别指出的是南诏王室，目光远大，有作有为，不仅在中南半岛上创建了军事大国，还做了对后代子孙产生长远影响的两件大事：

一、请唐王朝代培了一大批民族知识分子。当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也是一位很有远见的历史人物，他奉准招收南诏上层子弟到成都读书，规定每年 15 至 20 名，3 年后学成回国，前后沿续了整 60 年（799—859），共达一千余人。这就给南诏培养了一个汉文化程度较高的民族“士阶层”，即今天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阶层。里面有些人的诗作还选进了《全唐诗》中，不愧是上乘之作。这件事对西南少数民族来说，是了不起的大事，历史性的创举，对后代西南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南诏王室，也包括河蛮大姓，放弃了自己的原始宗教，而改奉佛教。唐代是佛教最盛行时期，皇室上下都深笃信佛。唐玄宗、肃宗父子二人都曾请佛教密宗阿耨梨师僧灌过顶，表示虔诚皈依佛法。南诏入唐使臣到长安，唐王都要给他们赠送佛经佛像，要他们回大理供奉。有一次是唐玄宗特意给南诏王室送了一部《金刚经》，南诏王遵命在太和城上半坡筑城盖寺，供奉《金刚经》和佛像。南诏上层贵族开始有抛弃“鬼主”（朵细薄）改奉佛教的。但佛教的经典都是汉文译品，复杂、繁多、难懂，没有一大批精通汉语文的民族知识分子作导师，大力进行宣讲，很难在民族地区深入传开。可以这样说，没有本民族的汉文化高的“士阶层”出现，佛教根本不可能在河蛮群众中间生根，但没有佛教的传入，河蛮居民的汉文化也不可能这样的深入发展，影响到千百年后的子子孙孙，可以说一直延续到现在。一个民族放弃了自己的原始宗教而改奉佛教，这不仅是精神文化上的大飞跃，它也会促使物质文明大踏步的前进。今天我们可以反过头来看，当时河蛮大姓都放弃了原始宗教而改奉佛教，他们上前了，而那些坚

持原始宗教、拒绝信奉佛教的民族，也包括河蛮的某些支系，他们仍处于落后状态。

从唐代中后期即公元八世纪开始，河湟地区出现了汉文化水平较高的民族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既能治理国家，又在传播佛教。他们既是释又是儒。寺庙成为学府，知识出自僧侣。原辽王朝贵族耶律楚材，曾随成吉思汗西征，他主张“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其实大理国早已这样，他们就是“儒释合一，治理国家”，足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是西洱河地区各族人民安居乐业，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也是社会经济文化多方面与中原更接近、溶合的时期。元初郭松年和李京是亲眼看到的见证人，他们对当时大理国在社会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成就，一则说，“江山之美，亚于江南；灌溉便利，禾麻蔽野，百姓富庶。”一则说：“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有故国之遗风。”又说，“吏治文化、侔于中州。”忽必烈亲身到过大理，他曾说“朕固乐其风土，曩非历数在躬，当于彼请分器焉”。意思是说，不是他哥宪宗蒙哥早死，要由他来继承蒙古大汗，他就想请封在那里为王。他登上大汗宝座之后，又想封他的皇子为云南王。后因有人劝阻而罢。（见滇志：赡思丁传按语）。他迁都北京之后，还把原来供奉大理王室的厨司、画师、漆工、雕刻工等各色手艺高超的工匠，调了一大批到北京皇宫里供奉。可见他对大理怀念之深情。此外，我们还看过现在珍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馆的《大理国张胜温画卷》和失落在日本、美国的《南诏中兴画卷》、《大理写经》以及观音铜像等稀世珍宝的照片和文字介绍，不由我们后代子孙对南诏、大理时期的如世界著名的大画家张胜温等祖辈们的才华智慧感到十分惊奇，也感到自豪。

但随着元王朝的覆亡，原大理国统治阶层的末日也到了。1382年明军到昆明，蒙古贵族梁王全家投滇池自沉。12月明兵到西洱

河，段氏大理守军中有投降内应的，沐英麾军乘之，段氏兄弟及其他贵族全部被俘，介送南京。明太祖特赦了段苴仁、段苴义兄弟并授以官职。一个到雁门，另一个到武汉，后者的子孙落籍在安徽合肥。其余大部僧侣放回，官员不论大小，多数处死。其中只有极个别的年青而才貌好的，经宫刑后发到各亲王府供奉。至此，南诏和河蛮大姓历时六个世纪苦心经营的羊苴咩城也被夷为平地，变成“天荒”。这也要用明初随傅友德征云南的山西人武德将军师毓秀的十三代孙诏州人师荔菲的话来说明：

“自傅、蓝、沐三将军临之以武，胥元之遗黎而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册，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炬。既迁富民以实滇，于是滇之土著皆曰：我来自江南，我来自南京。”“甘以他产为词”。“迄今（明亡，编者）已百五十年矣，而滇中土人犹自慑其余威，引为口实。”（见《滇系：沐英傅书后》）

现在时间又过去6个世纪，我们居住在祖国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的苦难日子，在共产党，毛主席亲手制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和指引下，算是彻底结束了。白族作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开拓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几个兄弟民族之一，也为史学家们所公认了。只不过说我们作为南诏、大理的后代子孙，应该为我们祖先的功业，还要作些阐释和发扬继承。好在白族的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河贱居民——白人的子孙，依然生活在我们祖先发祥的这块土地上，我们祖先遗留下的东西，有形的无形的，地上的地下的，颇为丰富，都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去发掘、收集、整理、研究。至于那些古今中外有关的著名典故，野史，和历代学者们的专著，特别是最新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最为难得珍贵，也要我们认真阅读，去伪存真，加以利用。

我们要随着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用开拓精神，既不依恋古人，也不迷信权威，更不能“夜郎自大”，也不应妄自菲薄，

要实事求是，恰如其份的说清我们祖先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建立的功业。这是我们后代子孙的职责，也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远居边陲，孤陋寡闻，学识浅薄，难免有错误和不足之处，恳求读者赐教！

张 旭

1993年2月20日

试论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

杨永新 赵寅松

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一直争论较多，有氏羌说、傣族说，最有影响的是彝族说。笔者认为南诏王室和清平官、大军将并不存在两种民族成分的构成问题，在南诏政权建立之前，在洱海地区有众多部落，随着南诏的统一，这些部落就形成了同一部族的共同体——白族。本文拟就此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从张乐进求逊位细奴逻等看南诏王室的族属

南诏先人，源于哀牢夷。《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子女。九隆兄弟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的记载几乎如出一辙，惟改“沙壹”为“沙壶”，并说“南诏昆明祖之”。剔除其荒诞的成分，这段记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历史线索：第一，九隆时代是哀牢夷由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逐步向一夫一妻制的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代。第二，哀牢夷是洱海地区昆明族的先人，他们因种族繁衍，“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

溪谷。”^①南诏是他们中的一个支系，到唐初，开始活动在巍山一带，势力逐渐强大，其社会形态尚处在部落联盟向阶级社会过渡，并不断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张乐进求逊位细奴逻的传说应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关于张乐进求，很少见于正史记载。《白古通记》中说：“战国时，楚庄踞据滇，号为庄氏。汉元狩间，庄氏后有尝羌者，与白崖主争衡，武帝乃立白人仁果为滇王，而踞氏绝，仁果传十五代，为龙佑那。当蜀汉建兴六年（事在建兴三年），诸葛武侯南征，师次白崖，立为首长，赐姓张氏。遂世据云南，或称昆弥国，或称白国，或称建宁国。历十七传，当唐贞观世，张乐进求以蒙舍酋细奴逻强，遂逊位。”^②它书还有这样的记载：“先是细奴逻同其父龙迦独避难，从哀牢山至蒙，耕于巍山之麓。细奴逻数有神异，孳牧繁息，部众日盛。时张乐进求为云南大首领，因祭铁柱（按：弥渡遗址尚存）。铁柱者，武侯所立，岁久剥泐，进求重铸之，既成，合酋长九人，祭天于柱，细奴逻与焉。有鸟五色，飞集于柱，久之又飞憩于细奴逻左肩，众以为异。如此者十八日，鸟乃去，于是众心咸归，张乐进求妻以女，且逊位焉……。城龙圩团山上，号大封民国，称蒙舍诏。”^③这段文字，看起来荒诞不经，但给我们探讨张乐进求和细奴逻的族系提供了某种线索。

过去人们对“白子国”是否存在的问题颇有异议，有的根本否定有“白子国”。今天，随着弥渡白王古城遗址的发现，“白子国”的存在，应该是肯定的。当然我们还不能断言，“白子国”已具备了国家的性质，但作为一个部落联盟的存在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怀疑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张乐进求的逊位显然不单纯是一个

① 《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② 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白古通记》。

③ 倪颢《滇云历来传》。

神话故事，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含义。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摩尔根《古代社会》关于古代部落酋长的更替，都要举行庄严的盛大集会，全体氏族、胞族和部落的男女老幼都要参加，进行民主选举，中国历史上把它重笔渲染推重为“禅让”。很清楚，张乐进求的逊位正是通过一次盛大庄严的部落酋长联席会议，经过民主选举与罢免而转让的。即：在铁柱前举行一年一度的部落酋长会，细奴逻作为蒙舍的部落酋长前来参加。张乐进求让位后，同时也就理所当然地将以金鸟作为图腾衣饰的象征权力的衣裳披在细奴逻肩上。古代部落联盟是按种族、氏族、部落繁衍分支自然形成的，它有严格的界限。显然张乐进求和细奴逻应属同一氏族系统，否则细奴逻既无资格参加部落酋长会议，更不可能接受张乐进求的“禅让”。

过去论者常常引证樊绰《蛮书》中“六诏并乌蛮”和《新唐书·南诏传》中“南诏乃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为论据，又置“别种”二字不顾，简单地将乌蛮和彝族划等号，以此来证明南诏王室是彝族。且不论乌蛮和白蛮是普通名词，不是专用于民族称谓（对此许多同志已有精当论述，兹不赘述），仅就这句话本身来解释也很难得出六诏即乌蛮，乌蛮即彝族的结论。南诏故地几乎囊括整个滇西，既然六诏乌蛮、乌蛮即彝族，那白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怎么到南诏时期会突然冒出一个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白族，进而占据了南诏的清平官、大军将等所有重要位置呢？古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如同我们现在这样去认真的民族识别。值得珍视的是李一夫同志在《南诏王室族别初探》一文中，征引了与南诏同一时代的西藏《墀都松墀德宿藏传略》称：“在南边的底地国土中有章地的一部称为白蛮，他们的国君有许多人民，但是在告诉他国家的广阔，富庶的长久的看法，白蛮国君阁罗凤，即时对他致敬。”并进而推断说明洪武年间云南第一布政使司张纘在他写的《荡山寺记》中称“蒙、段二氏皆白人”是有

依据的。^① 这些记载都是别的民族古人做的，特别是吐蕃，它和南诏的关系至为紧要。天宝之战以后，双方曾结为兄弟之国，接触频繁，又是紧邻，这些记述应该说是可信的。联系南诏历代国王多次自称“大封民国”、“大封人”，“古读‘封’如‘帮’，‘封人’或‘封民’即‘白人’或‘白民’。”^② 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有的同志为了坚持南诏王室是彝族，又要照顾南诏王室后来在彝族中后继乏人的问题，就提出了南诏王室彝族白族化。这有没有可能呢？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民族之间的同化和离异是经常发生的，但这主要指民族的个体而言，如果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它具有很顽强的稳定性，要想将它彻底征服是比较不容易的。欧洲人征服美洲，采取野蛮的种族灭绝政策，对印第安人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但印第安人作为一个民族至今依然存在。南诏时有三十七部，直到明代仍见于记录，同样证明一个部族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根据我们实地调查，姚安、祥云、弥渡等地是历史上白族聚居、繁衍的重要地方。洪武十四年，明军打开大理，大规模进入云南后，对大理实行屯田包围的形势，沿弥渡、祥云、鹤庆、宾川设置了无数的“营”、“屯”包围圈，进行屯田军垦，实行强制同化。在鹤庆至今还流传着“逢屯必汉，逢村必白”的说法。因此在姚安、弥渡等地，原先众多的白族居民不见了，被融化在汉族居民当中，祥云、宾川还零星剩下一些白族村寨。但在白族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区大理，却不是汉族同化了白族，而是相反。如大理的上下弯桥、上下波罗旁、北五里桥都是明代进来的汉族军户，由于长期与白族错居杂处，婚娶往来，有的已完全白化，有的形成了白族话开头，汉话结尾或者汉白两掺的白

① 李一夫《南诏王室族别初探》，《大理文化》1981年第2期。

② 见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中华书局版。

族。在少数民族受压迫歧视的历史时代，诚然也有一部分白族知识分子为了在仕途上争一席之地，有时也把自己的家谱改为汉族，但自然的法则依然是个体的异族人常常能较快地融合进当地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大理南甸中村的张家是昆明来的汉族职工，剑川欧家是内地到剑川做官的，现在都是道地的白族了。解放前说“剑川无汉”，不是无汉，而是融合了。这些例子无非证明：融合民族的个体是容易的，也是正常的，但要融合一个民族是困难的。如果信如某些同恣所说的，南诏就是彝族，那么在当时云南彝族不是少数，怎么能设想如此强大的彝族一直作为云南的一个重要民族延续下来，而仅作为南诏王室的彝族却白族化了呢？南诏曾经雄踞西南，统帅六诏，唐王朝加以注目，吐蕃不敢小窥，声威远播东南亚，但至今仍未发现用彝文记载的南诏王室的谱牒，这也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此外，在南诏发展史上，许多派遣到唐和吐蕃的重要使节都是人所公认的白族大军将、清平官。他们在南诏政权的内政外交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蒙法时，“遣宰相赵隆眉、杨奇混、段义宗朝行在，迎公主。高骈自扬州上言：‘三人者，南诏心腹也，宜止而鸩之，蛮可图也。’帝从之。隆眉等皆死，自是谋臣尽矣，蛮亦衰。”^①过去论者常常引喻蒙古族和女真族入主中原，利用汉人作官建立起强大政权，来证明南诏王室是彝族而广大臣民是白族。表面看来，的确蒙古人和女真人都是少数，他们的朝廷中也有汉族官吏，州、县两级政权多半委之汉人，但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嫡系部队，主要军政大权是绝不委诸异族人的。清朝后期稍有变更，那是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结果。

^① 《新唐书·南诏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二、南诏多数地名为白语给我们的启示

白语是白族共同的通用语。洱海地区是白族自古以来生息、繁衍的主要地区。一般喜欢近水居住，从事农耕，栽培水稻。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互相交换劳动产品的集市，如大理三月街、邓川渔潭会等。赵式铭在《云南白文考》一文中曾说：“凡滇西人相接，一操白文，辄曰：我白子一家也，则皆喜，若故交者，其远而益亲如此。”^①问题是南诏时期通行的语言究竟是彝语还是白语？对当时语言保存较丰富的《蛮书》卷八载：“言语，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大虫谓之波罗，犀谓之矣，带谓之殛直，饭谓之喻，盐谓之宾，鹿谓之识，牛谓之舍，川谓之𡵓，谷谓之浪，山谓之和，山顶谓之葱路，舞谓之伽傍。加，富也。高、阁也。诺，深也。直，俊也。”持南诏通行白语说的同志解释：“虎为罗，州为殛，带为佉直，饭为喻，阁高也，直俊也等，直到现在的白语中都是这样。”“如盐，白语叫‘闭’，‘宾居’叫‘闭更’ bilgel；南诏劝利晟呼王嵯巅为大容，白语兄弟叫容胎 zuftex^② 大容就是大哥，至今依然。倪蜕在《滇云历年传》中说：“昔人谓夷别音在音不在字，华别字在字不在音，理则然。”在此剖析南诏几个地名，以资南诏通行白语说的佐证。

关于“诏”的含义，长期以来论者多引证《新唐书·南诏传》中“夷语王为诏”来解释。有的同志进一步推论：“氏族曾称王为诏，六诏地近氏族，而符秦势力曾经远达川滇，称王为诏，自

① 转引自《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杨■《试论云南白族形成和发展过程》。

② 转引自《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李一夫《对白族的起源和形成的意见》。

不足怪也。”^① 近来有的同志对“诏”字的含义作了深入的调查和新的探索，认为“诏”字的本义应该是指组成“群”“伙”的氏族、部落、部落集团。^② 笔者认为“诏”是白语，意为“一片地方”。在今天的白语中，“诏”的用法仍很普遍。如称“一片荞子地”为“古诏”gvzaox，“一片麦子地”为“孟诏”merxzaox，“一片开荒地”为“坑（去声）诏”kefzaox，不胜枚举。因此，“六诏”原意指“六块地方”，“六片地方”，或者是“六个人群居住的地方”。南诏在诸诏之南，所以叫“懒诏”nazaox。又，白语叫巍山为“闷火”meho，巍山为南诏故地，蒙氏主之，因此闷、蒙变音，指的就是蒙姓。“火”即聚居集团，和“诏”意相同，也与“家”、“氏”相通。后来这些聚族而居的氏族开始向部落或部落联盟过渡，原来的氏族首领开始称王称尊，“诏”就开始由地理概念变成了包含象征权力的“王”的意思，难怪汉文献后来把“诏”与“王”混为一谈。又以邓赧诏为例，显然是指“盛产豆子的地方”。白语的“等”det就是豆子，“等”“澄”同，后来改称邓川也还是出产豆子的坝子之意，与邓赧之意没有什么变化。这也足证“诏”的本意是“一片地方”。也许有人会问，在白语中，“赧”为“川”的解释已成定论，“邓赧”本身就含有“产豆子的坝子”之意，怎么会把坝子和地方重复呢？其实在白语中，“赧诏”相连的说法并不少见。从严格意义上讲，“赧”与“诏”是有区别的。“赧”一般泛指坝子；而“诏”则专指坝子中的某一部分，也有一群人居住的意思。

由此可见，“诏”本意非王是很清楚的。今天白语中“王”、“头目”一般叫“秃等”tolde，当然我们不能以此上溯说南诏时也是如此称谓，但也没有表现出“诏”即“王”的痕迹。《新唐书·

① 见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证》。

② 王元甫《南诏和白族的几个问题》，《大理文化》1981年第4期。

南诏传》载：“元和三年，异牟寻死……子寻阁劝立，或谓梦湊，自称‘骠信’，夷语君也。”《资治通鉴》称浪穹诏主为“时傍昔”，李京《云南志略》中载：“蒙氏名细奴逻，城蒙舍之龙圩图而都之，自称奇王，云南建国称王始此。”笔者认为，南诏语中的王可能是“信”“昔”，而“信”、“昔”、“细”是同一意思的不同译写，因为在今天白语中，称祖先为“细武”*xilngvx*，他不确指一人，泛指已过世的列祖列宗，寄托着尊敬和崇拜，这样解释似乎更近情理一些。

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在他的《读史方輿纪要》西洱河条中说：“西洱河亦名洱水，以形如抱珥也。一云，如月生五日。亦曰洱海，亦曰西洱海，杜佑谓之昆弥川。”其实，洱海的“洱”字也是白语。大理白族叫洱海为“耳稿”*erxgo*，“耳”是指下边，“稿”（去声）指江河和海。“耳稿”就是“下边的海子”。白族一般以水流方向定上下，苍山十八溪注入洱海，所以称洱海为“耳稿”。时至今日，大理地区仍有“冬如耳稿”*doxsvrterx*的说法。“冬”是指上面的意思，“如”是山，“冬如耳稿”意为“上山（指苍山）下海（指洱海）”。此外，如喜州叫“狠简”*hexjaix*，是意译；鹤庆叫“恶凯”，意为鹤在的地方；浪穹叫“老后细”*laoholxix*，意为水冒出的地方；“红岩”原名叫“白崖”。从这些地名的考察，无不说明这些地方是白族土生土长的故土。

《通典》卷一百八十七，《新唐书·南诏传》都记载：“昆明国，一曰昆弥，西南夷也，在爨之西，以洱河为界，即叶榆河也。”《读史方輿纪要》中也说：“赵州（今凤仪）南十四里，本名昆弥山。明初，平西侯沐英过此，更今名。”（指定西岭——引者），由此可知，“弥渡”*mitdut*一词是白语，汉语意为在昆弥岭的东边。过去对“昆明”一词的解释多有歧义，其实，“昆明”、“昆弥”是今天白语“稿米”*gaomeix*的变音，意为住在海边的人群，说明这些地区都是白族活动的主要地区。

语言，是一个民族相异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日常用语往往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事物的不断出现而容易更新，改变其最初的面貌。惟独地名，若无重大的外界因素，如沐英进兵滇西而改昆弥岭为定西岭，王莽镇压楚人起义而改胜休县为胜楚县外，往往能较原始地保留下来。特别是白语，因本身没有文字符号可供记录，历代口耳相传，较容易保持古音古义。所以对地名的剖析，更能提供我们一些有用的历史线索。

在此，有两个问题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一、所谓白蛮语言最正，蒙舍蛮次之，它是和什么语言对照而言？不论以汉语对照，或指白语的正次，都表明从语言上说白蛮和蒙舍同操一种民族语言，只不过因为所处地点不同而有正次的微小差异。若说蒙舍蛮就是乌蛮，又与白蛮使用同一种语言，那不是不可思议了吗？二、关于白语的问题，议论也很多，有的说是古汉语，有的则说是彝汉两语的混合，有的甚至求出其中的百分比例，这些探索研究，不是没有益处，事实上白语中借用了大量的汉语词汇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词汇，这是民族文化交流，民族语言发展的正常现象。但绝不可否认的是，白族仍有自己的基本语言和词汇，有自己的文法，这是区别于别的民族的特点。

共同语言的形成根源于共同的经济生活。根据剑川海门口新石器时代文化近年来的大量出土文物以及最近下关大长屯古墓发掘出土的文物证明：第一，洱海地区早已种植水稻，人们早已定居。司马迁“毋常处，毋君长”的记述，不能概括洱海地区的全部历史状况。第二，从元谋人的发现，证明云南这片地区，早有人类先民栖息繁衍，并不是真空，洱海地区，自不例外。因此，根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传》中“皆氏类也”一语，就推断出这里的先民都是氏羌之属，而且是从西北迁徙来的说法，已为出土文物所推翻。第三、庄跻王滇西迁而成为白族先民建立南诏说，根据近年出土文物证明，滇文化和洱海文化显系两种文化系统，从